



改革史

凌志军

著

# 变化

1990—2002年中国实录

人民日报  
出版社

凌志军 著

# 变化

1990—2002年中国实录

人民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变化: 1990—2002 年中国实录 / 凌志军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115-0352-7

I. ①变… II. ①凌…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1990~2002 IV. ①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5440 号

书 名: 变化——1990—2002 年中国实录

作 者: 凌志军

---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朱 岩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封面题字: 蒋 宏

---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2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http://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95 千字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15-0352-7

定 价: 45.00 元

## 再 版 序

《历史不再徘徊》、《沉浮》和《变化》都已有过多种版本。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希望把它们合为《改革史系列》再行出版，因为这三本书的内容在时间上前后相续，大致覆盖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们国家的改革历程。这理由似乎可以成立，但并不意味真的可以把这几本书当作“史”来读。实则就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来说，我的记录仍有不少空白，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几年就很少涉及。即使我所描述过的那些年，也只是些片断，不是全部。更何况作者的写作只是出于一己之眼光、胸怀和成见，无论怎样豁达通透，也不能做到周全无误。所以，把这些文字看作这段历史的一个补充或者参考，可能更符合实际。我一直把自己当作记者，没有治史的理想，其中缘由，我在过去几次的序言中已经提到，不再赘述。

此外还有几句话，需向读者交待。

《历史不再徘徊》这本书此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发行过几种版本。这次新版增加了一段文字，也即“序幕”，此外全部如旧。这篇“序幕”是原稿的一部分，并非后来的补充。当时是作为全书点睛之笔的，所以尽力言无不尽。可惜这种“言无不尽”在当时情势里有可能成为公开出版的一个障碍，乃至编者不得不把整篇“序幕”全部舍弃。这种大胆而又不能无畏、百转千回才能到达目标的情形，正是那种历史环境中文人论政的写照。现在这个新版终于把“序幕”依原作收录，这在我和原版编者都是弥补了一桩遗憾。

《沉浮》曾在1998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现在这一本是依据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重排的，内容没有增删。它从来都不是一本影响很广的书，但我却对它最为珍惜。它容纳了我对自己职业的理解和信念，所以，从“基因”上来说，它最像是我的“儿子”。它出版前后的命运最为坎坷，甚至连累它的编者也改变了命运。多年以来我在内心深处对他们，以及所有为了出版

# 前 言

本书的酝酿和写作历时三年，增删五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涉资料主要来自我对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公开的出版物，也有一些是我亲身经历的，内容浩繁，巨细混杂，困难在于比较、鉴别以及取舍。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 1990—2002 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崇尚伟大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只有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

但是这本书仍然只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正面和侧面，不是全部，其中不免牵涉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也用大量篇幅去叙述那些看来无关宏旨的小人物和小事情，对于另外一些大事件，比如申奥成功、中美飞机相撞、禁止“法轮功”、揭露远华案、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等等，却又几笔略过。其增删繁简的主要依据，并非出自史家标准，甚至也不是时事政治的尺度，而是作为一个记者的眼光。书中所叙仍以指出中国的弱点为多，这也不是否认我们国家的进步，而恰恰想要更好地进步。在我看来，有时候轰轰烈烈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久远，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其沉浮逆转，书中已经述及。

中国是一个是非太多的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给予我的一个教益，是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是非。人的一生，有些事情是永远不能妥协的，比如信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接纳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人各有志，也都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另外一方面，自己不赞成的东西，未必

没有存在的根据。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怀着纯粹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特别希望摒弃情感上的偏见，客观平和地对待那些我喜欢的和不喜欢东西，又希望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增进各种思想的沟通，化解成见，相互补充。我的一个同事，也觉得“是非过于分明，有时候未必是件好事”。她的年龄较我几乎小了一辈，天资聪慧，拥有自己的爱憎好恶，却又与世无争，其处世平和，同龄少有，她有一次以林语堂为例提醒我：“不要因为思想犀利，忽视了从容的魅力。”

检讨过去几年里我写的东西，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过于“犀利”，所以每次都会引起争端，以致书评的篇幅远远超过书的本身。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对于所有这些褒贬，我都心存感激。2002 年春天出版的一本书，还把马立诚和我在四年前合写的《交锋》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我们党发起的新一轮交锋”。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梁柱先生主编，里面专辟一章批评《交锋》，计有 42 页，又牵连到我写的另外几本书。无论那些话说得有没有道理，我都觉得欣慰。对于我的赞扬与批判都能连篇发表未遭阻碍，而我依然拥有思考、写作和发表的权利，这本身也能证明我们国家已有长足的进步。

可是很多事情不能简单地以好与坏而论，实际上不论多么高明的作者，都不能摆脱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我本人接触过一些达官贵人，更多的时候是生活在寻常百姓中间，较多普通人的情感，以一己之眼光、见识与胸怀去观察大世界，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又不肯改变初衷，所以除了再接再厉，别无他途。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致使他人不快，那只是因为我的修炼不够，而非本意。

我总有一个心愿：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让政论像小说一样动人。首先要明白的是，对历史的理解，不是在书斋里可以读到的，也不是仅凭个人天赋就能产生，而是要在积年累月的历练中，见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生活，听到不同的声音，自己又有过最糟的和最好的境遇，对比起伏跌宕，品味其中酸甜苦辣，才能领悟。

我本人自幼崇尚技术，轻视文史，家境算是好的，又不属于特权阶层。如果一切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发展，自然一帆风顺，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政治是非。可惜“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变化任何人都不能躲避，我自此中断学业，少年离家，先在农村做一电工，后来参军，白天练习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腰酸腿疼胳膊红肿，晚上却又不肯早睡，蒙在被子里打开手电筒学习数理化以及英文，不幸被连队首长发现，批评我不安心保卫祖国，还想

到外国去，于是悬崖勒马，把全副身心投入军事。有一天首长忽然告诉我不要再埋头训练，改行写新闻。我知道那并不是因为我有文才，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我的父亲在报社工作。父亲的确是做新闻的。他出身于旧式农家，却又向往新生活。17岁离家出走，以文为生，18岁投奔共产党，一生本分，听党指挥，而将个性收敛，把思想压在内心深处。我在童年时总能听到他的朗朗笑声。他喜欢在周末和我下围棋，一边落子一边给我讲“霸王别姬”的故事，还说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但是后来他的笑声渐渐少了，终日沉默寡言，总把双眉紧锁，身体越发消瘦，体重不到90斤。人家都说“人到中年瘦是福”，但我知道他的变化与“福”无关。有一次我想让他开心，把围棋捧到他面前，心里期望再次听到他的笑声，他却推开棋盘，淡淡地说他不喜欢下棋了。1978年夏天，我被调回北京，到新华通讯社做记者，在离开父亲十年之后终于回到他的身边。那个早晨我冲进家门，告诉他“子承父业”的消息，以为他也会高兴，不料他仍然没有笑容，仍然沉默。1985年他62岁，身患肝癌，病入膏肓之际用枯槁如柴的右手拉住我的衣角，好不容易开了口：“做……正直……诚实的记者，很难……很难。你能……能吗？”那一瞬间，他深陷的眼睛里有一滴泪，既纯净又混沌。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在哭。我来不及细想他的话，只盼他的眼泪能流下来，因为怕他把泪水带进坟墓。可当时他躺在病榻之上，仰面向天，所以眼泪并未夺眶而出。他就这么走了。我去八宝山公墓为他送行，看着他的躯体和眼泪在火焰中化做一缕青烟，然后又到他的办公室去收拾遗物，有些文件，有些信函，有些书籍，有些会议记录，最厚重的一叠稿纸居然都是他的检讨，其中一份的题目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那是他在18年前写的，竟还留着。我在他的桌前坐下，只看了第一行，已是泣不成声。

因为有了这些经历，不免品格复杂，越是思念父亲就越是不愿像他那样无奈地生活，头脑中形成“否定一切”的习惯，崇尚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不能与流行的政治思想雷同，又不肯按照多数人的标准攀登成功之梯。于是退居斗室，终日写作，孤灯寂影，心底风起云涌，耳边澎湃有声，都只能对无形的听者诉说。经过无数悲伤与欢乐，重温父亲一生，逐渐明白做人须比做事付出更多，生命的质量比生活的质量更值得求索。此后几年稍有成果，又去感受被赞扬和被批判、被追捧和被冷落、被热烈包围和被寂寞笼罩，在这两极世界中不停地冲撞，这才越来越把胸怀敞开。内心拥有了自己也拥有了整个世界，方知个人渺小，生命的独立与自由，要在大历史中获得。

25 年前开始记者生涯的第一天，阎吾先生对我说：“新闻是瞬间的历史。”他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军事记者、我的上级，也是我的前辈。他们那一代人，是以这样的信念投身于自己职业的。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只是在秉承这一传统，把无数瞬间连缀起来，加入个人判断。不敢期望这将成为历史，能够让读者喜欢，已是很奢侈的愿望。

就我本人来说，还有一个多年来挥之不去的私念，就是能够对得起父亲遗愿，所以我将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如果他还活着，该是 80 岁了。

作者

2002 年 12 月 15 日子上海



# 目录

## 第一部

### 谷底(1990—1991)

---

第一章 活着的祖宗 / 3

第二章 大灾年 / 28

第三章 死灰复燃 / 49

## 第二部

### 风云际会(1992—1994)

---

第四章 转折 / 75

第五章 盛世无英雄 / 103

第六章 新人治国 / 137

## 第三部

### 潜流激荡(1995—1998)

---

第七章 软着陆 / 165

第八章 伟人逝去的日子 / 198

第九章 朱镕基与民心向背 / 226

## 第四部

###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

---

第十章 殊途同归 / 255

第十一章 忏悔的年代 / 296

第十二章 新人类,新生活 / 324

尾声 后继者 / 361

第一部

谷底

(1990—1991)



斯基看作悲剧英雄而把瓦文萨看作得志小人。可是有 24 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聚会在布鲁塞尔，决定掏出 40 亿美元，支持这小人的“把阉马变成牡马”的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几年以来发生在波兰的事情，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重演。在我们的国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急剧地旋转起来。奇怪的是，所有最重要的消息都是在私下传递的，公开发布的新闻则视而不见。

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装糊涂，唯有这件事不成。“冷战”就要结束了。当然，它也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结束之前的冲突格外激烈和残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有些人还真不是装糊涂，而是自作聪明。比如有几个宣传部门的官员就告诫属下报刊的总编辑，正确看待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还剩下的两个领袖：一个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此人尽管主张改革，但却是个“民主主义者”；另一个人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是反对改革的，还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处处影射攻击中国的改革，但他毕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他讲话的时候，听众 65 次起立，向他鼓掌和欢呼。

媒体摘取了这些情节，添油加醋地传达给读者，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和他们一样，相信齐奥塞斯库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危机，完全是一小撮坏蛋捣乱的结果。可是接着就有更加令人惊讶的消息传过来，不仅证明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的那些掌声和欢呼都是虚伪的辉煌，而且还表明齐奥塞斯库的“社会主义”已经被人民摒弃。90 年代开始之前的两个星期，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另外一个城市蒂米什瓦拉，市民走上街头，党的官员则派出军队。反对和保卫齐奥塞斯库的行动在街头相遇，演变成大规模冲突。

军队开枪的那天是个周末。现场录音辗转到了维也纳，然后在电台播出，里面一片混乱：喊声、哭声、口号声和枪声……全世界都听到了。对中国的媒体来说，这个晚上最大的问题是，根本隐瞒不住这些消息。很多人整夜都不睡觉，天一亮就更加活跃，他们守在收音机的短波频道旁边，在嘈杂的噪声中辨别出断断续续的话，结果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这是真正的“罗马尼亚事件”。另一家西方电台，美国之音，则具体地描述了那一天罗马尼亚街头的死伤者，说有 1000 人被打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偶尔出现几个画面，证明来自“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的消息，大都不是无中生有。这些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集会上的讲

子，不过这一回他可不是往日那个风流倜傥的样子，而是一个囚犯——他在四天前就被逮捕了，神情茫然，面容憔悴，目光里充满恐惧。还有人发现了齐奥塞斯库弟弟的尸体，警察的验尸报告说他是自杀的。

这一连串变故毫无疑问构成了 20 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共产党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过好多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人世间所有最复杂最微妙也最强烈的感情一起涌出：震撼与解脱、兴奋与悲伤、厌恶与同情、崩溃与新生。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前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独裁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美国之音”坚持说，他的罪行之一是屠杀 6 万多人，还企图携带 10 亿美元逃到别的国家去。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也难怪报刊的领导人会沉不住气，当时就连中南海里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们，也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 16 个字，意思是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政治局于是召开特别会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荇卿奉命去同几天前枪杀了齐奥塞斯库的新政府打交道，说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这是 80 年代最后一周发生的事。那些天，北京的书店里面，那些已被抛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像日夫科夫的精装本文集，还摆在书架上。驻扎北京的军队奉命提高警惕，特别小心在北京西郊大学集中的地区出事。好在大学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有几个大学生来到复兴门，站在那里发表讲演，围观者几千人。警察很快来了，驱散了人群。一时间，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那时候中国人的神经特别脆弱，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会产生联想，一联想就会神经过敏，好像射向齐奥塞斯库的枪弹也正在朝我们中国这边射过来似的。

现在历史终于走进了 90 年代，全世界都在闹事。没有出事的地方也在期待着出点什么事。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作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拿很多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



亲属者出国留学。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托派”分子立即一败涂地。清华大学有个叫刘兵的学生，就此写了一首《出国谣》。有人说这是“校园新歌曲”，也有人说这是“抗议歌曲”的一种形式。从来没有谁录制发行，却是那一年京城大学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与后来的那些矫揉造作的流行艺术全然不同，《出国谣》内容平白，边说边唱，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性情，段落之间的过门，全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以吉他扫弦伴奏，既快乐又悲伤：

唧唧复唧唧，有人念外语  
嘴里 ABC，耳边单放机  
哥们儿你想什么，你心思在哪里  
给我讲一讲，出国的道理  
小时候爱做梦啊，长大了没出息  
睁开眼看一看，现实的问题  
一颗红心，早已交上去  
可满腔的热血，还得养活我自己  
苦学十几年啊，毕业是五十七  
囊中羞涩，找不到亲爱的  
勒紧裤腰带，日子还过得去  
可论资排辈，活得没刺激  
啦啦啦……

唧唧复唧唧，我也念外语  
念出了 ABC，我念不出好消息  
文件发到手啊，我差点背过气  
条条框框，都跟我过不去  
我爹妈爱祖国，海外没亲戚  
非直系非旁系，出国准没戏  
我念过托福儿，也念过 GRE  
现在要回家，再念人民币  
咸盐一毛五啊，面酱两毛七  
今天你不买，明天买不起

啦啦啦……

唧唧复唧唧，再没人念外语  
听不到 ABC，只听到人叹息  
哥们儿你别走啊，你要去哪里  
陪我遛一遛，再见你不容易  
我说大兄弟，你何必苦自己  
眼看要毕业，还不赶紧改主意  
向别人学习啊，不要信自己  
做一颗螺丝钉，傻人有傻福气  
薄的是学问，厚的是脸皮  
受穷不受累，好歹有吃的  
不要怕后悔，前途是拐弯的  
不要怕忍耐，道路是加长的  
多听爷爷的话，多唱奶奶的戏  
美好的生活，幸福又甜蜜  
啦啦啦……

那时候这样的歌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校园歌手陡然走红起来，几乎全都渗透着年轻人的崇尚自由的本性和自认为被压抑的烦恼。有一首歌叫做《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这是90年代初期北大、清华最流行的校园歌曲之一，为北大的两个学生巴特尔和杨单涛所作，前者以唱英文歌曲闻名，后者的脖子上总是吊着个十字架项链）。有一首描述了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经历：“楼上的人没有广场上的人多，楼上的座位不是我们能坐。重要的是多拍几个镜头，也是到此一游。”还有一首唱到了北京大学：“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们都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中跃起。啊……我的梦就在这里。”

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已经很少看见人们围坐在草坪上唱歌的景象。草坪上的人倒是不少，可大都是相对而坐含情脉脉的情侣和到处跳跃的孩子。可在那时候，草坪是校园歌手的天堂。其中最有名的地方是北京大学静园的那块草坪。每到周末傍晚，“草地歌手”纷纷来到这里，弹一只吉他，有时候是疯狂的吼叫，有时候是婉约的和声，总是吸引一大堆人围坐旁听，浸了一屁股的露水也不肯离去。他们唱自己的歌，也唱那时的流行歌，有罗大佑、崔健、



齐秦、赵传、郑智化和黄舒骏的，还有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有个名叫沐阳的北大学生每次都在这里流连忘返，直到多年以后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有一帮人经常出现，可能是北大的教工子弟，唱得最好，他们爱唱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所有歌曲，外加《一块红布》。”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1989年年底由中国旅游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这是崔健那时在大陆授权发行的唯一盒带，也是中国第一盘摇滚歌曲专辑，包括九首歌曲，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吉他伴奏，自己演唱，歌词平和，旋律悲亢，节奏强烈，情感激昂。有那一年里最为流行的《一无所有》，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会唱：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还有《让我睡个好觉——为修复卢沟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他就是卢沟桥，卢沟桥就是他：

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  
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  
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  
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崔健这个人当日中国流行歌坛上的异类，也是无数青年心中的偶像。把他的歌词“一无所有”写在T恤衫前胸后背，再印了他的名字，穿在身上走来走去，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而他自己的演出服永远是一身旧军装和一双大皮靴，这让人想起60多年前的红军和20多年前的红卫兵。有时候他会在头上扎起一条红布带，那时候“酷”这个词还没有，但很多中国青年心中已经有这种感觉。他们为崔健的扮相而发狂，当他以这种形象走上巴黎的舞台时（据说他是当时唯一能在巴黎亮相的中国大陆歌星），连那些矜持的法国人也激动起来。

崔健矮个子，长头发，看上去既文雅又粗野，既深沉又奔放，就像他的